

民族文学论文选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DE-26/06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论丛

民族文学论文选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1123772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论丛
民族文学论文选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大邱庄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3125印张 384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1001-008-5/I·2

(书号：10441·3) 定价3.50元

目 录

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刘俊田 白崇人 禹克坤 (1)

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互相影响与交流

.....白崇人 刘俊田 禹克坤 (10)

谈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的

建设问题.....李德君 (18)

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若干特点初探.....刘一沾 (30)

民族文学界定标准之我见.....吴重阳 (45)

谈少数民族英雄史诗.....陶立璠 (54)

略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整理问题.....钟 健 (67)

动人的民族心声

——少数民族获奖短篇小说简谈.....张掄中 (70)

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

(哈密写本) 研究.....耿世民 (73)

维吾尔古典文学名著《福乐智慧》浅析.....魏萃一 (101)

略谈元代维吾尔族曲家贯云石及其散曲.....苗 林 (111)

“柔巴依”浅析.....马树钧 (119)

维吾尔情歌.....耿金声 (125)

试谈哈萨克族诗歌的结构特点.....李增祥 王远新 (129)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及其研究.....胡振华 (141)

《诗镜》及其在藏族诗学中的影响.....赵 康 (157)

试论《萨迦格言》.....耿子方 (173)

评藏族文学名著《米拉日巴传》	佟锦华(193)
试论格萨尔其人	开斗山 丹珠昂奔(208)
藏剧和藏剧故事	王 尧(224)
古代藏族谚语集——《松巴谚语》	谢后芳(235)
可喜的收获 前进的起点	
——藏族作者用汉文创作的短篇小说简论	
	莫福山 刘万庆(244)
《美与丑》中的松特儿	孔相如(250)
草原上的小马驹	
——意西泽仁及其短篇小说创作	
	刘万庆 莫福山(253)
元代回族诗画家高克恭	林 松(261)
浅谈“花儿”的一般表现手法	丹珠昂奔(276)
成吉思合罕与扎木合薛禅	
——谈谈《蒙古秘史》的人物	
	乔·贺西格陶克陶(285)
论蒙古族红学评点家哈斯宝的小说理论	邢 莉(302)
从《说不完的故事》中想到的	乌力吉(315)
略谈好来宝	满都呼(327)
对精神文明的强烈呼唤	
——玛拉沁夫和他的短篇小说《活佛的故事》	
	董尚效(335)
论清代满族作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贡献	张菊玲(341)
当代满族文学的瑰丽珍宝	
——试探老舍《正红旗下》的创作	
	关纪新(360)
瑶族古典歌谣集成《盘王歌》管探	刘保元(373)
谈谈瑶族的《信歌》	盘承乾(387)

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

——序《苗族史诗》

.....马学良(390)

从神话传说看苗汉两族的历史渊源关系

.....美逢 行人(401)

凯棠苗语的诗词格律.....陈其光(415)

富有苗族风情的笙歌

——试谈《吹响我的金芦笙》的民族特色

.....吴德坤 潘定智(451)

苗族新时代的颂歌

——简评苗族诗人潘俊龄的诗集《吹响我的金芦笙》

.....白润生(462)

彝族的民间文学及节日.....李廷良(471)

土壤、种子、繁花

——试论傣族长篇叙事诗特别繁荣丰富的原因

.....张公瑾(477)

少数民族文学

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刘俊田 白崇人 禹克坤

我国现在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共同创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在文学艺术上，少数民族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不可能只是单一民族的。瑰丽多姿的中国文学，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我国各个民族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地说，直至建国前，一些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在社会发展、生产水平上是落后的。但是，绝不能因此说，少数民族在文学艺术上也是落后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文学艺术是一种精神生产。文学艺术在发展中要受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文学艺术样式中，这种决定性的具体表现，却要受到文学自身特点的制约。因而，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在某些文学样式中，文学艺术的发展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并不是一致的。例如，十九世纪的俄国，其经济和社会制度在当时的欧洲是落后的，但是，在文学艺术方面，特别是在小说创作方面，却处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领先地位。又如，神话这种体裁，它的繁荣发展，只能在较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才有可能。而神话一旦产生出来，就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纳入人类艺术的宝库。

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尽管长期生活在落后的社会制度下，但是，他们在文学艺术上却有值得称道的成就，为我国文学艺术增添了异彩。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他们都有丰富的口头文学，有些民族还有珍贵的书面文学。许多优秀作品，广泛地描绘了各个民族的生活，塑造了一大批鲜明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各个民族的心理个性，道德情操，倾诉了他们心中的欢乐与忧愁。情感炽烈，形象丰满，格式特别，语言优美。其中如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彝族的长篇叙事诗《阿诗玛》、蒙族的史诗《江格尔》、维吾尔族的传说《阿凡提的故事》等，早已得到我国各族人民的同声赞誉，并翻译介绍到国外，在世界上也有广泛的影响。在我国文学艺术的大花园里，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之花竞相开放，争奇夺艳，妖烧多姿。由各民族文学艺术组成的这个大花园是一个艺术整体，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文学，

二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文学艺术上也是如此。与汉族的书面文学相比，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较为发达，成绩卓著。特别是在英雄史诗、长篇叙事诗、神话创作等方面，清楚地表明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特殊的地位与作用。

叙事诗（包括英雄史诗）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样式。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他们引为自豪的古老年代的叙事诗。在我国，汉族远在三千多年前就有了文字，并且很早就设立了史官，专门记载王国的历史。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致使汉族的诗坛上缺乏英雄史诗和长篇叙事诗。比较起来，少数民族叙事诗的创作则很发达。原因之一是，少数民族的文字出现较晚，文字记载的文献材料出现得更晚，有些民族直至建国初期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在这种情况下，

下，少数民族只得用便于记忆的韵律语言记叙他们的历史和认识，抒发他们的情感和理想。诗歌是美，也是历史，是科学，是政治。在几乎人人参加的艺术创作和欣赏的活动里，世代口语相传，他们的叙事诗的艺术水平日臻完善。几乎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一部或几部乃至几十部上百部的英雄史诗或叙事诗。篇制之宏大，内容之广泛，种类之多样，色彩之绚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出类拔萃的。除上文提到的几部外，这里我们不妨再列举一些。象哈萨克族的《考孜库尔帕西与巴彦苏鲁》、土族的《拉仁布和琪门索》、撒拉族的《巴西古溜溜》、裕固族的《黄黛琛》、门巴族的《太波嘎列》、洛巴族的《斯金巴娜歌》、壮族的《布帕》、瑶族的《密洛陀》、畲族的《盘古歌》、苗族的《古歌》、布依族的《伏哥羲妹造人烟》、白族的《开天辟地》、傣族的《召树屯》、佤族的《葫芦的传说》、拉祜族的《牡帕密》、纳西族的《创世纪》、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独龙族的《创世纪》、朝鲜族的《春香传》……真是浩如烟海，琳琅满目。面对这些神奇的作品，我们就如步入了叙事诗的王国！特别应该一提的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它不但内容丰富，艺术精湛，且篇制长达二十多万行，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玛纳斯是柯族人民传说中的英雄。史诗通过玛纳斯一家八代的英雄业绩，描绘了柯尔克孜族各部落统一起来反抗异族奴役的战争故事。它具有典型的史诗的内容，史诗的结构，史诗的笔法，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玛纳斯》以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叙事诗，象一簇簇烂漫的鲜花，怒放祖国的诗歌花园里，丰富了祖国诗歌的内容和形式。

少数民族的神话也很发达。神话是各民族文学最原始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认为，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土壤，可见神话在文艺发展中的作用。在我国，汉族有着内容丰富的神话。但这些神话被记录成文献却在封建社会。汉代的经学大师又曾经用

“信史”的眼光对神话作了各种解释与修改，以致现在很难弄清这些神话的原始面貌。再者，汉族的神话最初是作为历史地理的文献被记录在《山海经》等书里，以后才陆续见之以典籍的记载。因而，神话材料显得零散而不完整，记叙偏于概括而不够具体、生动。与此相反，少数民族的神话却是比较完整的，且更富有文学意味。一些少数民族直到建国前，仍处在奴隶社会以至原始社会的末期，他们的神话基本上保持了产生时本来的面貌，更为真实。又由于世代在口头流传，没有受到文字与语言分离的影响，保持了神话艺术的生动性。许多神话中有细致的描写，曲折的情节，富于美感。这里我们可以“射日”神话作些对比说明。

汉族有“羿射十日”的神话。屈原的《天问》提到“羿焉弹日”。《山海经》里有几条零星的记载。较为完整的记载是在《淮南子》里，但也只是“至尧之时，十日并出”，尧乃使羿“上射十日”显然过于概括和简略。苗、瑶、彝、洛巴、傣、景颇、藏、壮、布依、土家、赫哲、哈尼等少数民族都有“射日”神话。这些神话要比“羿射十日”具体生动。例如苗族《古歌·铸月造日》里的叙述就犹如一出新奇绝妙的史剧。古歌先是描写宝公等四人造了十二个日月，让日月按照十二个时辰“一天出一个，不要胡乱闯”；巨人冷王把日月送到天上，十二个太阳到天上后，“早上同时出，晚上同时照”；“小孩晒死了，没人养牛羊；姑娘晒死了，没人缝衣裳”；“后生晒死了，没人种米粮”，逼得大家要射金太阳；好汉桑扎自告奋勇要到东海射日月，经过一番挫折，桑扎站在玉树上，射下了十一对日月，剩下一双日月躲在岩后藏起来，结果“大地黑茫茫，活路不能做”，最后由公鸡每日在清晨傍晚，呼出太阳月亮，“日月亮堂堂”，“遍地喜洋洋”。这个神话反映了古代苗族人民对天体运行现象的认识，是对这一现象的形象化的解释。神话充分表现了苗族人民征服自然的意志与力量。在艺术描写上，有人物，有故事，有细节，有冲突。一

句话。有声有色。可以说，在中国文学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神话，更为完整的记录是在少数民族的民间创作中。

除口头文学外，一些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也有悠久的传统。如藏、维、蒙、傣、彝、朝鲜等都有用本民族文字创作的精美文学。它们在中国文学的园地里别具风味，放射着浓郁的清香。例如维吾尔族十一世纪的大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著的古典叙事长诗《福音智慧》，就长达七十二章，一万三千余行，内容几乎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此壮丽的长篇巨著，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不多的。用藏文写成的别具一格的《萨迦格言》，是一部内容和艺术水平都很高的作品。格言，做为一种文学形式，并由作家有目的、有计划进行创作，在藏族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自《萨迦格言》出现后，格言这种体裁就流行开了。相继还产生了《格丹格言》、《水树格言》等格言集。不能不说这是对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在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的艺术长廊里，产生了很多重要的作家和作品。除上面提到的作家和作品外，成就较高的作家还有如藏族的仁钦拜、拜登却吉、仓洋加错，蒙古族的罗卜桑丹津、古拉兰萨、尹湛纳希，维吾尔族的阿尤甫、萨木萨克、买买特、纳甫尔等。优秀作品如藏族的《吐蕃史记》、《西藏王统记》、《仓洋加错情歌》，彝族的《贝玛经》，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契斯坦尼艾力伯艾》，蒙古族的《蒙古秘史》、《黄金史》、《一层楼》和《泣红亭》等。

三

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代（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在汉民族形成以至发展中，不断进行着民族之间的融合（或同化）。相应的，汉民族的文学也是一种“融合”的文学。秦汉时

期的汉族文学就是当时南北两种民族文学的融合。《诗经》主要是北方黄河流域华夏诸族的文学。《楚辞》代表了南方长江流域荆蛮等族的文学。《楚辞》是在南方荆蛮等民族的民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的和地方的特色。尽管后来荆蛮等南方民族与北方的华夏族融合，形成汉族，但完全可以说，当时的荆蛮族具有少数民族的性质。在《楚辞》的基础上后来不但发展形成了汉赋，就是在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诗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乐府”诗，也汲取了《楚辞》的优点。而楚辞以它丰富多彩的内容、绚丽奇异的色彩，特别是它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成为我国文学的珍宝，长久不竭地给我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以积极的影响，哺育了我国多少诗人的成长！《楚辞》的事例雄辩地说明，中国文学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秦汉以后，汉民族文学在长期的发展中，曾不断地直接或间接地汲取着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营养，丰富了自己，壮大了自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想以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词”这种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

公元三世纪前后，我国北方有五个少数民族：匈奴、氐、鲜卑、羯、羌。他们相继进入中原的历史舞台，建立了十六个王国，把不堪一击的汉族的晋朝驱赶到长江以南。最后由鲜卑的拓跋部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了名声赫赫的北魏政权。在汉族的史籍中，把这一时期称为北朝。北朝民歌相当发达。现在在文献记载中还能见到的民歌有七十余首。其中大部分是当时少数民族的作品。有的尚能考证出其作者。如《企喻歌·男儿可怜虫》的作者是氐族的苻融。《琅王歌辞》的作者是羌族的姚弋。有些民歌原来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创造的，后来翻译成汉语。如《巨勒公主歌》、《敕勒歌》等。表现了北方民族英雄气概的《木兰辞》，从内容、风格、语言上看，也可能为少数民族的作品。北朝的民歌，不仅反映了各个民族的生活与理想，也是忠实地记录了一个

值得纪念的时代。

北朝民歌大约从东晋到梁武帝时陆续传到江南，受到梁朝皇帝的欣赏，经常在宫廷里演唱。因而在陈代释智永《古今乐录》里，在宋代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里，北朝民歌被称为“梁鼓角横吹曲”。东晋以后的南朝，在汉族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单从诗歌的形制上看，南朝使得五言诗成熟了，七言诗发展了。并且撒下了律体、绝句、词的种子。到了唐宋两代，这些种子都培植成为参天的大树。以“词”而言，梁朝武帝肖衍有《江南弄》七曲，近代学者梁启超称之为“填词笔祖无疑”。这里，不能不看到北朝民歌成为“梁鼓角横吹曲”对梁代文学，包括对《江南弄》的影响。“词”在南朝萌芽了，真正成长是在唐代中叶以后。“词”是汉族文学史上诵诗与音乐的又一次的结合。前两次，在《诗经》、“乐府”里，主要是与汉族的音乐的结合。到了梁朝武帝时，在《江南弄》里可以看到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词”在唐代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确定下来，则是与我国西北部少数民族的音乐的结合。据《隋书·音乐志》载，早在隋朝，隋炀帝定九部乐，其中除清乐是汉族的，天竺、高丽是外国的，西凉、龟兹、康国、疏勒、安国等都是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音乐。到了唐代，这些音乐大量输入长安。唐高祖时，沿用隋九部乐。唐太宗统治高昌后，立十部乐。《能改斋漫录》记载，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十分喜爱少数民族音乐，朝野上下形成一种风气。一些诗人，按照乐师演奏的曲律“被之以辞”，即填写上有意义的歌辞。这种歌辞的句式，随着“曲度变化”，有长有短。于是，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词”出现了。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词《菩萨蛮》，其词牌的名称以及关于这个名称的一些传说，透露了“词”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唐末，出现了专力写词的词人，到了宋代，“词”已成一种主要的文学样式。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词”的成长，少数民族是作出了贡献的。

元杂剧的形成和发展明显受到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影响。据《辍耕录》等书记载，在杂剧的曲牌中就有“哈儿图”、“伧里”、“哈儿火失哈赤”、“马黑莱当当”、“阿纳忽”、“乔木查”、“胡十八”等均属少数民族的曲调。这就说明了元代戏曲的发展、繁荣是汉族与西北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融合的结果。

四

在中国各民族文化长期的友好交往中，少数民族的文学也受到汉族文学的影响。汉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流传到一些少数民族那里，形成具有该民族特色的神话、故事。如汉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壮族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只是故事的场景添加了南国的色彩，主人公的性格更为爽朗，爱情的表现更为强烈。建国以后，在新疆吐鲁番的唐墓中，出土了坎曼尔的诗签。诗签有诗三首。从诗中可以看到坎曼尔是一位维吾尔族的贫民或奴隶。他在诗中写道：

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迄今皆通习为之。（《忆学字》）

这首诗作于唐代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说明远在唐代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和文人对汉族文字的掌握已达到纯熟的地步。不仅能阅读鉴赏李白、杜甫的诗歌，而且还能用汉文写出造诣较高的文学作品。由金元至清末，大部分历史年代里，是由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统治全国，进一步促进了各族的文化交流，涌现出更多的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文人作家。例如，回族的萨都拉、马九皋、纳新、丁鹤年、李贽，维吾尔族的贯云石、偃玉立，白族的杨齐鲲、李元阳、师范，满族的石君宝、纳兰性德、曹雪芹，蒙族的杨景贤、阿音咸，以及当时的少数民族契丹族的耶律楚材、雍古族的马常祖、唐兀族的余阙、西夏族的李惟忠等。特别应该指出，

伟大的满族作家曹雪芹的巨著《红楼梦》攀登了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为中国文学在全世界争得了荣誉和地位。这不是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少数民族的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吗？

祖国大家庭里的每个民族都是勤劳的、勇敢的，是具有艺术智慧的民族。在漫长悠久的历史岁月里，各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才智，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又有自己的短处。在友好的文学交往中，民族之间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为建设中国文学的殿堂，各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民族团结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各民族的人民、文艺工作者，一定能创造出更加瑰丽的文艺珍宝，为各族人民服务，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服务，使我们亲爱的祖国，屹立于世界文学的最前列。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日

（原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 互相影响与交流

白崇人 刘俊田 禹克坤

中国文学是由我国各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她包括汉族文学和各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她独特的内容和多彩的风貌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少数民族文学（包括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一般说来，是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或文字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和愿望，塑造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采取本民族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表现手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我们所提倡和鼓励的。但也有些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言文字进行创作。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就长期存在。

从历史上看，如北朝民歌的许多作者就是当时的少数民族（匈奴、氐、鲜卑、羯、羌）。元代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也不少，如回回族的萨都刺、高克恭、纳新、马昂夫；蒙古族的杨景贤、阿鲁威、泰不花；维吾尔族的贯云石、三宝玉柱、契玉立；女真族的石君宝、李直夫、奥敦周卿；党项族的李伯瞻；契丹族的耶律楚材、宇文公谅；唐兀族的余阙、昂吉、拜帖穆尔；雍古族的马常祖、赵世延；也里可温族的雅琥；康里族的金元素；朵鲁别族的郝天挺、郝经等。

在当代，用汉语言文字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已故伟大的人民艺术家老舍（满族）自不必说，其他成就较高的如蒙古族的玛拉沁夫、李准、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回族的胡奇、哈宽贵、赵之洵，藏族的饶阶巴桑、丹真贡布、伊丹才让，维吾尔族的克里木

·霍加，苗族的伍略、杨明渊、石太瑞，彝族的李乔、普飞、吴琪拉达，壮族的陆地、韦其麟、莎红、黄勇刹，满族的胡可、寒风、关沫南，侗族的苗延秀，白族的杨苏、晓雪、张长，土家族的汪承栋、孙健忠，东乡族的汪玉良，达斡尔族的李陀，仫佬族的包玉堂，京族的李英敏，赫哲族的乌·白辛等。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也是如此，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种现象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充分说明少数民族作家除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之外，也用汉语言文字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对汉族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言文字创作，是有其社会原因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在顽强地保持和发展着自己的传统和特点，同时又在不断地互相影响着、融合着，而其中接受大民族的文化影响较多。即便某一少数民族在某个时期占据统治地位，在文化上，也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接受大民族先进文化的影响。这种情况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曾出现过。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兴旺、强大一时的少数民族如匈奴族、鲜卑族、党项族、契丹族等都曾广泛地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以至后来都融合在汉族之中，满族曾征服、统一了整个中国，但也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甚至普遍使用了汉语言文字。当然，这种融合是相互的，汉族也在不断吸收少数民族先进的东西，丰富和发展自己。

因此，汉族文化便成为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同时又给少数民族以巨大影响。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长期与汉族杂居，交往甚密，他们使用汉语言文字就成为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了。戴良在《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一《鹤年吟稿序》云：“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而西北诸国如克烈、乃蛮、也里可温、回回、西蕃、天竺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京